

百年中的难题、主潮、多元探求、智慧与失误

二十世纪中西文论史

A History of Chinese and Western Literary Theories
in 20th Century



第三卷 中国文学（上）

王鍾陵 著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福建人民出版社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NG GROUP | FUJI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百年中的难题、主潮、多元探求、智慧与失误

二十世纪中西文论史

A History of Chinese and Western Literary Theories
in 20th Century

第三卷 中国文学（上）

王鍾陵 著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福建人民出版社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NG GROUP | FUJI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目 录

第一编 散文：文体分化与类型转换中的浮沉兴替 / 1

第一章 “文界革命”与“五四”时期的言文大争论 / 3

新文学运动的内在矛盾——王国维对清代学术变迁的说明及其缺点——“文界革命”产生的远源——乾嘉之学走到末路的原因——今文经学的复兴——以经术作政论——冯桂芬、郑献甫批驳桐城之“义法”及“文统”论——由时务之文到时务文体——梁启超“新文体”——维新派“文界革命”的由来及内涵——黄遵宪、梁启超论“言文合一”——袁廷梁首倡“崇白话而废文言”——第一波白话文运动——自晚清迄于民初散文文体发展的三个阶段——拼音运动——关于“废汉字”的争论——文字改革运动——晚清文体革命遇到的阻力——两个阶段文学史的衔接与嬗变——自编自演的一出戏：驳王敬轩——林纾之反对白话——严复：听其自鸣自止可耳——《学衡》派之反对白话文及鲁迅对《学衡》派之批判——《甲寅》派之反对新文化运动——在“桃子”上给一下小打击——傅斯年、徐民谋的言文差异论——鲁迅阐述白话文对个性解放与民

族生存的价值——言文关系形成三组交织、贯通的矛盾——散文文体最根本的矛盾及其展开为散文内部类属或类型的产生及转换——两个阶段的不同侧重

第二章 从“五四”杂感到三十年代的杂文 / 42

现代散文兴起之初的形式：杂感、随笔——《热风》中的两条思路——《热风》对鲁迅此后杂文的意义——鲁迅之使用“杂感”与“杂文”“小品文”和“小品”与“散文”等词及其散文史价值——鲁迅杂文演化的脉络及背景——两股思潮及鲁迅主张的两个方面——鲁迅思想之两项根源——白话与文言斗争的三个回合——鲁迅主张吸取欧化文法改进白话文——大众语阶段的来到——鲁迅十分重视拉丁化——鲁迅将“言文差异”论与“言文合一”论综合起来——大众语运动演变成一个文字与语言的运动及其文体学原因——鲁迅散文理论的三个方面——鲁迅对自己杂感与杂文写作的概括说明——《坟》的笔法比较宽广——《华盖集》《华盖集续编》与《华盖集续编的续编》的内容及其艺术特色——新旧交织的《而已集》——对鲁迅前期杂文的小结——探讨文艺与革命与政治的关系——鲁迅与正在兴起的社会政治学模式的两个方面的关系——鲁迅后期杂文的新特点及与前期之异同——《三闲集》《二心集》与《南腔北调集》之承续与变化——抨击时政的《伪自由书》——《准风月谈》与《花边文学》对社会世相的描绘与对谬见恶习的批评以及对文坛原生状态的勾画——鲁迅对杂文创作的新概括——鲁迅最后三个杂文集的内容及三项变动——总结：鲁迅杂文的特点及成就

第三章 由“人生的文学”走向雅人小品 / 128

周作人心中的两个鬼及其在文艺思想上的体现——周作人所谓“人生的文学”之内涵及其矛盾——“无形的功利”

论与“平民的贵族化”论——承认国民性——1923年周作人已拉抬明清小品——周作人从晚清到1925年的思想变化——三个因素的作用造就了周作人又一阶段的光荣——闲适的生活趣味及其在文学上的反映——周作人之走向提倡小品文的三个根由——周作人为现代散文重寻源头：明清的名士派文章——自1928年周作人的散文创作及理论的演化进入第三阶段——小品文：杂感、杂文与絮语散文交流的产物——向着言文差异的方向发展——周作人从文学发展的次序上拉抬小品文——鲁迅对小品文的批判——周作人在用词及议论上对鲁迅的因袭及两人之相异——林语堂在散文史上的位置及其总的路径——《翦拂集》的内容及风格——摧折了斗志——过渡性的《大荒集》——孤游与游读——我行我素与披荆而行——洋博士与京派大爷——《我的话》的水平及审美趣味——林语堂散文理论发展的内在逻辑及其产生的缘由——絮语散文的引入——“性灵”说之上溯“语丝体”——示范语录体——鲁迅对林语堂提倡幽默与雅人小品及语录体的批判——林语堂的言行不一、不懂装懂及其“幽默”——总评林语堂散文创作及其理论——从言文之争上来把握《语丝》派三作家的分流

第四章 对“美文”的探索 / 186

“美文”概念的提出及其被探索的意义——中西走向截然相反——两组矛盾与三个层次——《野草》是美文的起点及其文体学缘由——意象奇崛，着想奇特，多造境——直抒胸怀及借景或藉物抒怀——散文诗的定义——《野草》与《朝花夕拾》的血缘关系——回忆文不让人感到琐碎的原因——总结：《野草》《朝花夕拾》的风格、手法、成就及其文学史意义——叶圣陶对朱自清早期与后期散文的评价——太过注重修辞与尽量用口语兼备的《踪迹》——《背影》的得失——对写身边琐事和回忆文倾向的自我否定——向着写雅人小品倾斜过去——雅人小品与娓语体散

文的同异——四体划分形成——《欧游杂记》与《伦敦杂记》的缺点及在语言上的优点——总结：朱自清散文的成就及其创作过程的典型性——何其芳散文创作的目标——《画梦录》的两个特点及三种类型——《画梦录》的三项贡献及其成功之处——李广田散文的代表性及其散文路径的变化过程——散文与诗及小说在文体上的区分——与杂文分家后偏向于诗性来谈论散文——“意境”俨然成为散文艺术追求的中心——朱自清的《语文影及其他》及其将杂文说成小品文之转变的缘由——《雅舍小品》之成功与失败均源于雅得俗且恶——总结：对美文探索的两个阶段及其成就与鉴戒和对五六十年代的影响

第五章 从三十年代到六十年代散文类属的兴衰浮沉 / 253

白话散文发展的第三阶段——方非《散文随笔之产生》的三个要点——“言志”和“载道”在优劣势上掉了个——散文观的新模式——东西方历史道路之相异——推动报告文学崭露头角的四个因素及其兴起的过程——茅盾的“报告”观——从散文史的角度看报告文学产生之根由——报告文学的两种体式——三四十年代是报告文学理论的第一阶段——报告文学的本质特征、写法及文体定位——三四十年代报告文学创作之多种多样——报告文学的兴起对整个文学创作都形成一种转折——杂文中衰的原因——《野百合花》事件——白话散文发展的第四阶段——“特写”概念及相应理论的一度走红——奥维奇金理论对中国报告文学创作的两点影响——干预生活的报告文学被生活所干预——对特写可以“虚构”的清算——五十年代初及1957年关于杂文的争论——批判三家村——六十年代的报告文学：在新闻性与阶级性、真实性与典型性的矛盾中遽遽失措——报告文学座谈会——1957年以后的报告文学随着时代精神搏动——五六十年代为中国报告文学理论的第二阶段——“形散神不散”论的本质——秦牧式：知识型——秦牧对散文文体宽泛的界定及其散文史意义——刘

白羽式：物我关系型——杨朔式：诗意型——对十七年散文的小结——总结：从三十年代到六十年代，散文各类属的命运

第六章 新时期第一阶段：报告文学的兴盛与散文、杂文的困窘 / 330

白话散文的第五阶段——求真思潮的四个方面——报告文学及其理论发展的第三阶段——清算“反真人真事论”——报告文学可否适度虚构的争论再次展开——报告文学写作中的想象问题——讲求真实能否有文学性——报告文学中的小说化潮流——夏衍对小说化潮流的批评，要求写事件、写现象——长期存在小说化倾向乃缘于一种散文文体承担了新闻的任务——问题报告文学占据了文学舞台的中心位置及其兴起的原因——报告文学理论探讨出现四个变化——问题报告文学兴起的文体学根据——问题报告文学的缺陷——九十年代的报告文学——对中国报告文学及其理论发展历程的总概括——报告文学本体论——新时期第一阶段散文创作及理论发展中的矛盾——“新基调杂文”概念的孕育经过、内涵与性质——杂文领域中向着政治叛降思潮的体现——批判“杨朔模式”，使散文创作及理论向着四个方向分流并形成两组争论——散文的冷落及内容的琐碎狭小——新潮散文的得失——孙犁批评新潮散文——杨朔与孙犁各自的典型性——孙犁 1977 至 1980 年创作及议论的散文史意义

第七章 新时期第二阶段：“大散文”概念与“净化”说 / 385

“文化散文”与“大散文”当运的原因——《文化苦旅》拖了四年才获出版，却遇上了一个好时机——幼稚的“文化感悟”说——余秋雨大散文观及其三个优势与其内在矛盾——对余秋雨散文愈演愈烈的批判——不通的“大的文

化散文”概念——仅仅四年，余秋雨的散文观就破产了——余秋雨对批评者的反诬——雅与俗尖锐而长时间的对峙——十九篇“文化散文”中并无对文化的体悟——写景上无能——《文化苦旅》中的其他文章，质量参差——综观《山居笔记》，余秋雨的大言不惭完全是欺世盗名的大话——“文化散文”已经没有了散文——《霜冷长河》是本杂凑的书——连文化也没有了——对余秋雨散文的总评——“大散文”观与“净化文体”说的对立——“大散文”概念的尴尬——在世纪末，季羨林对“散文是什么”感到困惑——新潮散文的特点及其论者的三个误区——必须确立一种新的文学观——文体与时而变的两项内容——刘勰论颂体的演化——文体形态变化的两个方面的因素——文体的浮沉兴灭——从中国古代文体的发展上看“净化”说与“大散文”概念的错误

第八章 对二十世纪散文文体演化的总概括及对散文特征 的思考 / 435

二十世纪中国白话散文文体分化与类型转换的简要概括——二十世纪中国白话散文发展中两条线索的交织与融合——白话散文发展的各个阶段又是有机衔接的、流贯的——散文史本质矛盾的体现——散文理论的发展所面临的两个任务——二十一世纪散文研究的新视野——美文应如何写——散文本体论——网络散文的正负作用——鸿文懿篇的重要性

第一编



散文：文体分化与类型转换中的浮沉兴替

第一章

“文界革命”与“五四”时期的言文大争论

与西方在时间上相似，中国新的思想与文化潮流，其开端也在十九世纪中叶。鸦片战争中，英国以其船坚炮利，打败了以中央天朝自居的清王朝，迫使中国封建社会向着一种新的社会形态转化。资本主义生产造成了一个全球社会，你不找他，他来找你。文明华夏与蛮夷小邦，竟然来了个颠倒。红毛鬼子成了一个难以对付的妖魔。一系列没有听说过的国家都突然冒了出来。梁启超将晚清的大臣分为三类，其第一类便是“瞠然不知有所谓五洲者，告以外国之名，犹不相信，语以外患之危急，则曰此汉奸之危言悚听耳”^①。鲁迅也曾描述曰：“这些千篇一律的儒者们，倘是四方的大地，那是很知道的，但一到圆形的地球，却什么也不知道，于是和四书上并无记载的法兰西和英吉利打仗而失败了”^②。“清末之所谓儒者的结晶，也是代表的大学士徐桐氏”，“连算学也斥为洋鬼子的学问；他虽然承认世界上有法兰西和英吉利这些国度，但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存在，是决不相信的，他主张这是法国和英国常常来讨利益，连自己也不好意思了，所以随便胡诌出来的国名”^③。世界渐次在眼前展现着，在一场场战争失败所产生的极度的惊诧与震颤之余，中国人终于对

① 《戊戌政变记·政变前纪·政变之总原因》，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6册，中华书局1989年3月第1版，《专集》之一，第69页。

② 《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版，第314页。以下凡引自《鲁迅全集》1981年版者，均不再注明版本，只注卷数及页码。引者按。

③ 《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同上书，第314~315页。

新的生存空间愈益有了清醒的认识。亡国大祸迫在眉睫,救亡图存的社会运动随之崛起。

历史的进步与痛苦在这个时期深深地纠缠着:资本主义新文明的传播,是以罪恶的鸦片贸易为先导的,又是以一种比传统的弓马利箭杀伤力大得多的武器所强加的。不同于封建主义的新道德的输入,却是以一种谁也无法否认的不道德的行为来开辟其道路的。新的知识,不是以一种有益于人,而是以一种剧烈的有害于人的方式来呈现的。这样一种新文化的输入方式,在十分鲜明地展示了一种文化的强大与另一种文化的衰弱的同时,也将一种尴尬与耻辱刀一般地刻进了一个古老民族的心里。不仅仇恨外夷的心理与排斥现代文明的狭隘眼光会相伴而生,而且新文化的吸收、建设与救亡图存的需要也会产生既相成又相悖的矛盾景观。

第一个救亡图存的运动是维新运动。“公车上书”一时掀起巨澜,新旧思想斗争趋于白热化。虽然百日维新短命夭折,但慈禧新政却又继续上演,这正验证了马克思对黑格尔关于一切伟大的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所作的补充: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然而,无论如何,非改良求新不足以图存的认识,已经深入人心。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心理的基础上,物竞天择的进化观,方才产生了震动一个民族心灵的作用。文学上的改良主义伴随着政治上的改良主义运动而产生,维新派的“文界革命”“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构架了从封建主义文学向着现代文学转换的桥梁。

就其侧重及主要贡献而言,如果说康有为是维新运动的政治家,谭嗣同是维新运动的哲学家,那么梁启超则是这一运动的文学理论家。钱玄同说:“梁任公实为创造新文学之一人,虽其政论诸作,因时变迁,不能得国人全体之赞同,即其文章,亦未能尽脱帖括蹊径;然输入日本新体文学,以新名词及俗语入文,视戏曲小说与论记之文平等(梁君之作《新民说》《新罗马传奇》《新中国未来记》,皆用全力为之,未尝分轻重于其间也),此皆其识力过人处。鄙意见现代文学之革新,必数梁君。”^①

然而,构成了二十世纪自身特质,而不是十九世纪残余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其发端的直接契机,乃是“五四”运动。鲁迅1933年所说,散文小品“原是萌芽于‘文学革命’以至‘思想革命’”^②的话,具有普遍的意义。

基于特定的生存环境而产生的历史使命,使得新文学运动从它诞生起,便存在一个

^① 钱玄同:《寄陈独秀》,引文依1917年4月1日《新青年》第3卷第1号。《中国新文学大系》第1集《建设理论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10月初版)收入此文,在其第52页上,这段引文有下述改动:“日本新体文学”改为“日本文之句法”,“必数梁君”改为“必数及梁先生”。此信刊于《新青年》第3卷第1号“通信”栏,并无题目,题目当为《建设理论集》的编选者胡适所拟。引者按。

^② 《小品文的危机》,1933年10月1日《现代》第3卷第6期;《鲁迅全集》第4卷,第576页。

深刻的内在矛盾：它既要承担远绍维新派的救亡图存的时代重任，又要完成从封建主义文化形态向着现代形态的转换。这一转换有着两项内容：一是个性的解放与表现。郁达夫说：“五四运动的最大的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见。从前的人，是为君而存在，为道而存在，为父母而存在的，现在的人才晓得为自我而存在了。”^①二是现代新文体的建设与对于新的艺术技巧的探索。既然文化形态转换的要求，是从救亡图存与社会转型的需要中衍生出来的，那么矛盾的主要方面自然便在于前者。这一矛盾两个方面力量的不平衡状态，决定了包括新文学运动在内的整个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必然道路。大致上说，当反侵略的或社会政治的要求相对和缓时，新文化的建设就比较侧重自身；当各种矛盾愈趋紧张时，社会就会拉紧其与文学的关系。而个性与集体、个人与社会的矛盾关系，则成为贯穿二十世纪的一个重大而艰难的课题。

二

在维新派所提倡的“文界革命”“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中，以“文界革命”对于社会产生的震动作用最为巨大。在中国，广义的“文”的观念一直十分盛行。《文心雕龙·征圣》篇曰：“政化贵文”“事迹贵文”“修身贵文”^②，《序志》篇又曰：“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五礼资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③。正是基于此种对于广义的“文”在社会生活中所起作用的实际感受，因此刘勰将文的起源前推到“与天地并生”之时，予“文”以一种泛自然化的本体性，并慨叹曰：“文之为德也大矣”^④。因为从朝廷章奏到民间信札，均谓之文，所以，“文界革命”的产生，与社会思想、学风变化的关系，比之“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就要更为深广得多。追溯“文界革命”产生的原因，自然就必须高屋建瓴地从思想与学术的变化上加以考察。

1919年，王国维概括有清一代的学风变化曰：“我朝三百年间学术三变：国初一变也，乾嘉一变也，道咸以降一变也。顺康之世，天造草昧，学者多胜国遗老，离丧乱之后，志在经世，故多为致用之学，求之经史，得其本原，一扫明代苟且破碎之习，而实学以兴；

① 郁达夫：《导言》，《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8月初版，第5页。

② 《征圣》，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卷一，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9月第1版，第15页。

③ 《文心雕龙注》卷十，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9月第1版，第726页。

④ 《原道》，《文心雕龙注》卷一，上册，第1页。

雍乾以后，纪纲既张，天下大定，士大夫得肆意稽古，不复视为经世之具，而经史小学专门之业兴焉；道咸以降，涂辙稍变，言经者及今文，考史者兼辽金元，治地理者逮四裔，务为前人所不为，虽承乾嘉专门之学，然亦逆睹世变，有国初诸老经世之志；故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道咸以降之学新。”^① 顾亭林是国初之学的开创者，王国维以“经世之学”名其学，称其特点为“以经世为体，以经史为用”^②；戴震、钱大昕是乾嘉之学的代表，王国维以“经史之学”名其学，称其特点为“以经史为体，而其所得往往裨于经世”^③。前者以服务现实为体，而以学术为其工具；后者以学术为体，其学术研究的心得自觉或不自觉地也有益于现实。虽有体用上的颠倒，但这两个时期的学术，均为王国维心目中的楷模。龚自珍、魏源为道咸以降学风的代表，王国维对这一时期的学风有肯定，也有不满，他说，这一时期，“学者尚承乾嘉之风，然其时政治风俗已渐变于昔，国势亦稍稍不振，士大夫有忧之而不知所出，乃或托于先秦西汉之学以图变革一切，然颇不循国初及乾嘉诸老为学之成法，其所陈夫古者不必尽如古人之真，而其所以切今者亦未必适中当世之弊。其言可以情感而不能尽以理究，如龚璘人、魏默深之俦，其学在道咸后虽不逮国初、乾嘉二派之盛，然为此二派之所不能掇，其逸而出此者，亦时势使之然也”^④。一方面，处于一个时事急剧变动时代的王国维，深明时运交移、质文代变的道理，所以他扣住时势而论学风；另一方面，王国维又有一个“成法”在胸，故责道咸以降的学术，“其所陈夫古者不必尽如古人之真，而其所以切今者亦未必适中当世之弊”。他在承认这一时期学术有“可以情感”的优点的同时，也指出了其“不能尽以理究”的缺点。

王国维对于清代学术变迁的上述说明，存在两个问题：一是作为矢志前清的遗民，他有意回避了从经世之学转向乾嘉之学，除了“离丧乱之后”，晚明游谈之学为人厌弃这一原因外，还有一个清廷大兴文字狱对士人施加了严酷的精神压制的缘故；第二，他的思维方法也还只停留在“时势使之然”的社会时事层面上，还不大明白至少是还没有自觉地认识到学术也有其演化的内在逻辑。比如，从乾嘉之学转向道咸以降的学风，除了国势不振、士人逆睹世变的原因外，也还因为笼罩一世的乾嘉之学存在一些内在的缺点，以至于曾国藩在表彰他崇拜的姚鼐时曾这样说过：“当乾隆中叶，海内魁儒畸士，崇尚鸿博，繁称旁证，考核一字累数千言不能休，别立帜志，名曰汉学，深摈有宋诸子义理之说，以为不足复存，其为文尤芜杂寡要。姚先生独排众议，以为义理、考据、词章，三者不可

① 《观堂集林》卷二十三《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王国维遗书》第2册，上海书店出版社1983年9月第1版，第582～583页。

② 《观堂集林》卷二十三《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同上书，第583页。

③ 同上。

④ 《观堂集林》卷二十三《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王国维遗书》第2册，第583～584页。

偏废，必义理为质，而后文有所附，考据有所归；一编之内，惟此尤兢兢。当时孤立无助，传之五、六十年，近世学子，稍稍诵其文，承用其说。道之废兴，亦各有时，其命也欤哉！”^① 曾国藩一方面正确地指出了乾嘉之学考核一字累数千言不能休，繁称旁证，而义无所归的缺点；另一方面他对于学风变化的原因也是以“亦各有时”的原因来加以解释的，这也是不能从学术的内在逻辑上来把握问题的表现，所以他方才叹息于“其命也欤哉！”

比曾国藩所说的姚鼐之“独排众议”稍早一些时候，与学古文于刘大槐的程戴园唱和过的袁枚，就在《与程戴园书》中说过：“近见海内所推博雅大儒，作为文章，非序事噂沓，即用笔平衍，于剪裁、提挈、烹炼、顿挫诸法大都懵然。是何故哉？盖其平素神气沾滞于丛杂琐碎中，翻撷多而思功少，譬如人足不良，终日循墙扶杖以行，一旦失所依傍，便依依然卧地而蛇趋，亦势之不得不然者也。且胸多卷轴者，往往腹实而心不虚，藐视词章，以为不过尔尔，无能深探而细味之。刘贡父笑欧九不读书，其文具在，远逊庐陵，亦古今之通病也。”^② 这一段话独到地说明了乾嘉考据之学在思维方式上对学人的影响：其好处是“腹实”“胸多卷轴”，亦即养成证实的习惯，缺点是易使人陷入于琐碎丛杂。而“作为文章”是还需要一种结构篇章与文字表达的能力的。刘放嘲笑欧阳修不读书，但他的文章却远没有欧阳修写得好，袁枚引这个例子意在表明“胸多卷轴者，往往腹实而心不虚，藐视词章”，此为“古今之通病”。这样一个引例的扩展，不自觉地说到了考据之学与词章之学在思维方法上所存在的一种恒定的差异。由之，我们可以探测到何以道咸以降学风的变化是以一个治今文经学的文学家龚自珍来开头的缘故了，这当中不仅有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不同使然，而且也还有词章之学与考据之学的差异在起作用。理解了这一点，也就抓住了维新派“文界革命”所由产生的深刻的远源。

梁启超曾对乾嘉之学的分类及其走到末路的内外原因，有过论述。他说：“本朝学派，以经学考据为中坚，以为欲求经义，必当假途于文字也，于是训诂一派出。以文字与语言相联属也，于是音韵（古音）一派出。又以今所传本之文字，或未可信据也，于是校勘一派出。以古经与地理多有关系也，于是地理一派出。以古经与天算多有关系也，于是天算一派出。以古经之名物制度与今殊异也，于是名物制度一派出，是为乾嘉时代最盛之支派。”^③ “考证学之研究方法虽甚精善，其研究范围却甚拘迂。就中成绩最高者，惟训诂一

① 《欧阳生文集序》，《曾文正公全集·文集》卷三，光绪（丙子）二年（1876）季秋湖南长沙传忠书局木刻本，李瀚章编辑，李鸿章校刊；王云五主编《万有文库》本《曾文正公诗文集》（上）《文集》卷一，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82页。

② [清]袁枚：《与程戴园书》，《小仓山房文集》卷三十，嘉庆元年（1796）随园刻本。

③ 《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第1册，中华书局1989年3月第1版，《文集》之七，第87～88页。

科,然经数大师发明略尽,所余者不过糟粕。其名物一科,考明堂,考燕寝,考弁服,考车制,原物今既不存,聚讼终末由决。典章制度一科,言丧服,言褻衿,言封建,言井田,在古代本世有损益变迁,即群书亦末由折衷通会。夫清学所以能夺明学之席而与之代兴者,毋亦曰彼空而我实也,今纷纭于不可究诂之名物制度,则其为空也,与言心言性者相去几何?甚至言《易》者摈‘河图洛书’而代之‘卦气爻辰’,其矫诬正相类。诸如此类者尚多,殊不足以服人。要之清学以提倡一‘实’字而盛,以不能贯彻一‘实’字而衰。”^①

经世之学关心人心世道之污隆、政事之利病,这就需要穷其原委,于是拱手空谈就不顶用了。黄宗羲批评“明人讲学,袭语录之糟粕,不以六经为根柢,束书而从事于游谈”^②,他主张“问学者必先穷经,经术所以经世。不为迂儒,必兼读史”^③。顾炎武之学,“大抵主于敛华就实。凡国家典制、郡邑掌故、天文仪象、河漕兵农之属,莫不穷原究委,考正得失”^④。“经世”二字,是明学转向清学的关键;但“经世”的追求本身也只是个过渡,因为向着历史实证的寻求,必然逐渐会使得学术向着取得相对独立地位的方向发展,于是经世之学乃变为经史之学。然而,考据之法对于恢复历史面目的作用是有其限度的,原物之不存,以及事物在历史流程中之变动不置,对于后代人之试图逼近前代历史的原貌,都会构成一种难以逾越的限制。但是,取得了一代学术正宗地位的乾嘉之学,难以看到自身的局限,考据家们潜藏的知识结构便开始走到了前台,亦即各个考据家便因其自身知识结构的不同,而对找不到实证材料或实证材料不足的研究对象展开了猜测,这种猜测一旦向着一个并不正确的方向扩展开来,便成为谬想,从而产生梁启超所说的“其为空也,与言心言性者相去几何”,以至于“其矫诬正相类”的情况。

一方面,乾嘉之学以不能贯彻一个“实”字而衰;另一方面,社会政治及思想的形势又经历了一系列的变化。梁启超说:“嘉道以还,积威日弛,人心已渐获解放;而当文恬武嬉之既极,稍有识者,咸知大乱之将至;追寻根原,归咎于学非所用”。“清学之发祥地及根据地,本在江浙。咸同之乱,江浙受祸最烈,文献荡然;后起者转徙流离,更无余裕以自振其业。而一时英拔之士,奋志事功,更不复以学问为重。”“‘鸦片战役’以后,志士扼腕切齿,引为大辱奇戚,思所以自湔拔,经世致用观念之复活,炎炎不可抑。又海禁既开,所谓‘西学’者逐渐输入,始则工艺,次则政制。学者若生息于漆室之中,不知室外更何

①《清代学术概论》第二十节,《饮冰室合集》第8册,中华书局1989年3月第1版,《专集》之三十四,第51页。

②《清史稿·儒林一·黄宗羲传》卷四百八十,第43册,中华书局1977年8月第1版,第13105页。

③同上。

④《清史稿·儒林二·顾炎武传》卷四百八十一,第43册,第13167页。

所有，忽穴一牖外窥，则粲然者皆昔所未睹也，还顾室中，则皆沈黑积秽，于是对外求索之欲日炽，对内厌弃之情日烈。欲破壁以自拔于此黑暗，不得不先对于旧政治而试奋斗，于是以极幼稚之‘西学’智识，与清初启蒙期所谓‘经世之学’者相结合，别树一派”，向着“正统派公然举叛旗矣”^①。

这个叛旗的树立，在经学上，便是今文经学的复兴。早已成为绝学的公羊学之复兴，其实亦为乾嘉之学所孳乳。在清儒遍注群经的风气中，戴震的弟子孔广森始著《公羊通义》。然梁启超称其不明家法，治今文学者不宗之。道咸以降之学的发端人，为武进庄存与，所著《春秋正辞》，刊落训诂名物之末，专求所谓微言大义。同县刘逢禄继之，著《春秋公羊经传何氏释例》，发明何休所谓“非常异义可怪之论”^②，如“三世”说，“受命改制”说等。段玉裁的外孙龚自珍，复又从之，“往往引《公羊》义讥切时政，诋排专制”^③。梁启超评曰：“综自珍所学，病在不深入，所有思想，仅引其绪而止，又为瑰丽之辞所掩，意不豁达；虽然，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然，稍进乃厌其浅薄；然今文学之开拓，实自龚氏。”^④

不仅是注经的风气，还有辑佚学的盛行，也为今文学的发展创造了相应的条件，随着对古经说片言只字的极力搜集，研究今文遗说者渐多。开头不过注意“家法同异而已，未及真伪问题。道光末，魏源著《诗古微》，始大攻毛传及大小序，谓为晚出伪作”^⑤。魏源此书的《齐鲁韩毛异同论中》篇，发端即曰：“甚哉！美刺固《毛诗》一家之例”^⑥。魏源以为《诗》有作诗者之心，而又有采诗、编诗者之心；有说诗者之义，又有赋诗、引诗者之义。由此，他说：“作《诗》者自道其情，情达而止，不计闻者之如何也”^⑦。魏源又据《韩诗序》之“自《关雎》《蟋蟀》《雨无正》《那颂》四篇为美刺外，余皆自作之词”，以及《新序》《列女传》载《鲁诗》诸《序》，“亦无一篇为美刺”^⑧。此种不同于《毛诗》的读解，议论道：“诗以言志，百世同揆，岂有欢愉哀乐，专为无病代呻者耶？”^⑨。梁启超以为，

① 《清代学术概论》第二十节，《饮冰室合集》第8册《专集》之三十四，第52页。

② [东汉]何休：《春秋公羊传·序》，崇祯十二年（1639）永怀堂刻本。

③ 《清代学术概论》第二十二节，《饮冰室合集》第8册《专集》之三十四，第54页。

④ 同上。

⑤ 《清代学术概论》第二十二节，《饮冰室合集》第8册《专集》之三十四，第55页。

⑥ [清]魏源：《诗古微》，岳麓书社1989年12月第1版，第166页。

⑦ 同上。

⑧ 同上。

⑨ 同上。